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巍巍红楼，矗立在北京市中心区域，
距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一个叫做沙滩的地方。
她的红砖、红瓦、红门窗特别耀眼；
从景山顶上远远望去，
恰如万绿丛中一点红，
更是别有风韵。
她，曾是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
她，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还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
筹划建立共产党一处革命圣地。

BEIDA
HONG LOU YI JIU

北大红楼忆旧

贺家宝◎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illegible]

1000

北大红楼纪念馆

100

100

北大红楼忆旧

贺家宝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胡说”小考

1948年，在北平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事件中，我曾以《新民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学生为反对美国这一错误政策游行示威的新闻；访问了一些教授、学者，报道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还报道并发表了437名教授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信。这些都表达了痛受日本侵华之苦的中国人，对美国悍然违反波茨坦宣言，纵容日本军国主义的卑劣作法的强烈愤慨。然而，这时却有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怕日本再度侵略是“过虑”，甚至是“神经过敏”。

胡适的奇谈怪论，自然遭到人们的责难。当我把报道胡适这一谈话的稿子交到《新民报》编辑部的时候，一位编辑先生，看后也对胡适的谈话感到不解，于是他就帮我作了这样一个标题：

“对美国扶持日本

胡适有健全看法（主题）

胡说：过虑者是神经过敏（副题）”

这是一个十分恰切而又精彩的标题。巧妙的双关语，有力地批判了这位崇美的胡博士的观点。这一深刻、简炼、

幽默而又富有艺术性的标题，受到读者的夸赞。

然而，后来了解到，“胡说”这一双关语并非这位编辑的发明，这里还有一则胡适自己承认“胡说”二字的掌故。知识渊博的编辑，正是引用了胡适自己的说法，标出这一精彩标题的。

“胡说”的出处，引起记者的兴趣。在图书馆、资料室经过长时间反复查找，终于找到了线索。现将胡适家乡安徽出版的一册《志苑》上的一段文字录下，作为参考：

“胡适的文章写得好，讲的比写的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外，聚天下之英才而讲演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癮’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古今中外，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顾不得自己大力提倡的白话文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癮，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二字，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對美國扶植日本

胡適有健全看法

胡說：過慮者是神經過敏

「上猶，美為部很（本
過又腰不國和時有本
「能？便民了有位訊
」，開他也可，胡
是所勝們不他龍月
「以利銀尤又的初
神必時指許談是他
經須，壯。到盛在
迷候會子他美軍南
飲復經，又國，京
「他對哩就扶何時
。的論在心植應就開
。一使日日飲和表
（實）部日本本，朋
工本沒人，王友
兼成有的認世推觀
。為補生為然和翁
「一民活美和翁有
他國地說國翁有說
認純了：不文長為
巧處，一會翻行在
怕樂別日使，映平
日歐人本日現在學
本家誰人本本外學
促，入侵果可街
略實為于略然能界
是照官為，是，葛

在“反内战反饥饿” 运动中我被捕了

1947年5月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把学生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5月18日，北大同学组织室传队上街，声势浩大的宣传，使反动当局胆战心惊。国民党调来208师几车打手和警察、特务一起在西单围攻学生，打伤多人，制造了“518”西单血案。这次，反动当局加强了新闻舆论控制，当晚就通知各报社一律采用中央社稿。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亲自跑到《新民报》打招呼，要求用中央社稿。我跟随北大宣传队上街采访，回到编辑部，一口气写了八条消息。我没理会来了不速之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写的稿子有根有据，且很重要，应当采用。正直的编辑作了一次巧妙的安排，不得不在一版发了中央社的稿子，可是把我其余的七篇稿子，在四版上全都发了。其中包括《继西单血案之后，北池子又一打剧》、《受伤的人》、《华北各院校组织“五一八”血案后授会》、《平津十一院校罢课》、《清华八十一教授签名响应同学罢课》以及汇文中学、艺文中学罢课消息。这样声势的报道，使反动当局大为恼火。

在我报道“五一八血案”后的第三天，反动当局就对

我进行了迫害。

5月22日，朝阳学院少数反动学生在校内撕毁壁报、标语，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反动分子报告警察局诬称“朝阳学生要暴动”，军警特务包围了学校，形势异常紧张。在朝阳法律系学习的我的一位老同学穆引弟，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新闻线索，我立即前往采访。当我向校方和同学了解完情况，正准备回报社写稿时，在朝阳学院所在地的海运仓胡同口，突然遭到一群便衣特务的袭击。一个戴墨镜的家伙，指着我叫喊：“就是他，就是他！”特务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我高喊：“我是新闻记者，是来采访的！”可也无济于事。随后，又来了几个警察，持枪逼我上了一辆卡车，就这样把我逮捕了。

开始我担心是秘密逮捕，并使我“失踪”，我就高声说：“我是记者！是《新民报》的记者！你们应该通知报社！”后来见进了警察局，才镇定些。但在“审讯”我的时候，一个家伙硬指我是“共匪”，说我去朝阳学院“鼓动学潮”。我出示了记者证件，坚持说是正当的采访活动，并要求他们通知报社。他们又说我是北大学生，我说，我是记者，也是北大学生，而且是北大法律系的，我懂得殴打记者、摧残新闻自由是非法的，没有证据的逮捕也是非法的。没有让他捞到任何东西，又经《新民报》的营救，他们只好在凌晨前就把我释放了。

在这次斗争中，我感到周围的进步人士，甚至可能是地下党员在支持我，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从警察局看守所接我出来的是《新民报》采访国民党警察局的记者高宗衡。（解放后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他见我激动得流出眼泪，就安慰我说：“别让他们唬住，他们抓人未必有真凭实

据，不过为了向上级交差，胡乱抓个替罪羊罢了！”这给我很大启发。在中共地下党员参加领导的北平市外勤记者联谊会，派代表对我进行慰问，并在报纸上就我被捕发表了表示遗憾的声照。同我在采访中密切合作的《北平时报》记者严灵、《新民报》记者雷希嘉等也都来看望我，亲切慰问。我还接到一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着一部分。朝阳学院提供我新闻线索的穆引弟，也到北大来慰问我，对反动当局对我的迫害表示愤怒。不久她就去解放区，改名穆颖。80年代她曾被调入北大，任党委组织部长。30多年后，我们再次相会，谈起这些往事，兴奋不已。

我所在的法律系的老师和同学，听到后都很气愤。冀贡泉老教授，帮我从法律上进行分析，鼓励我作坚决斗争。

我写了个抗议声明，交给《新民报》负责人张恨水。张恨水感到报社处境困难，写信给我说：

贺家宝先生：本公司现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同仁不能不忍辱负重，老弟因公受辱，本社限于最近恶劣之环境，无法作有力之表示，深为抱歉。稍后自当面晤汤局长一谈也。

兄恨水（汤局长即警察局长汤永威）

我写的抗议声明，还是经报社修改后，在1947年5月30日《新民报》上，以《愤怒的抗议》为题发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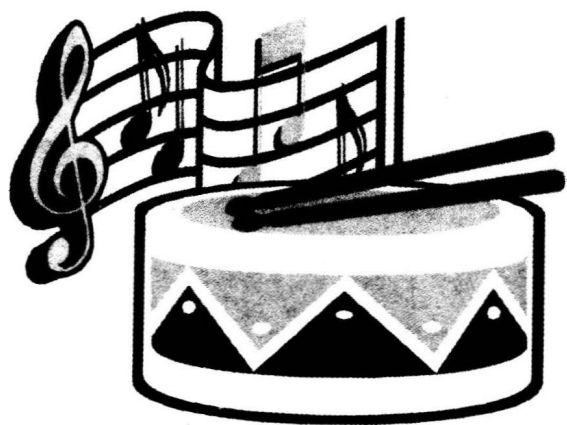
这样，我就继续兼做记者，开始了新的采访斗争。

这里顺便提一下，反动当局对我的迫害并未停止，1948年7月，社会局长温崇信把张恨水找去，指名道姓地说我是共产党。另外还有三人，“天桥版”编辑戏剧家马彦

次家五兄

本司司现正在风雨飘摇之中
同人不能不各尽义务 老弟为
公受辱本社限于最近要办之
环境无法作有力之表示深为
抱歉稍候自当耐时修书而表
一德也 定恨水

祥（解放后任文化部，戏改局局长），采访部主任钱家瑞（解放后任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改名钱辛波）、进步编辑刘励生和我一起被迫离开了《新民报》。我只好离开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到解放军区去了。



北大旧闻点滴
第六辑

北大的“小型联合国大会”

最近，美国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种对联合国权威进行挑战和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受到许多国家和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关注和谴责。这使我想起1947年，在联合国成立二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联合国周。那是为发扬国际和平思想、维护联合国权威，由北大国际关系研究会和政治系社团联合发起的。

联合国周于1947年11月举行。18日在理学院礼堂有联合国问题讲演会，由王铁崖、崔书琴、陈友松教授讲演。19日在理学院举行联合国晚会，有乐曲演奏、歌唱，并请外籍人士讲演。20日有电影晚会，放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纽伦堡审理战犯》等影片。22日北大图书馆举办联合国图书展。现将笔者采写的一条登在20日《新民报》上的消息，摘录于下：

北大昨日举行联合国晚会。胡适、周炳琳、崔书琴、樊弘、陈友松、马大猷等都到了，并有旅平各国人士二十余人参加。会场正面悬着用各国国旗组成的“UN”两个大字。演奏钢琴，开会。首先由胡适致词，他说：“今天到了这么多的客人，也不能说是客人，因为都是联合国的人民。记得1945年我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见

了好多老朋友，尤其是美国人，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过去曾发起组织国际联盟的，他们说，真没想到在我死以前还能参加这个盛大的大会。这些老辈人，对联合国抱了这么大的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不能对它失望，应该维护这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将来如果再有大战，对青年人，对青年人的子孙、子孙的子孙，会有多大损害！”……继由美国总领事克鲁勃致词，他说，“各国必须真诚合作，彼此之间需要了解，才能维持世界和平”。继由苏联代表本奇耶哥斯讲演，他用中国话说，“苏联人民对联合国组织抱着绝大的希望，因为苏联人民不好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国中每个国家都有贡献，苏联的贡献最大，所以苏联代表团坚持各国合作，使战争贩子露出原形来。苏联人民主张根除法西斯的残余，根据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树立和平与民主。二次大战中，中、美、英、苏互相了解，领导人民消灭了德、日法西斯，树立世界和平，这是真诚合作收到的效果……继由英、法、奥各国代表致词。演奏音乐后散会。

胡适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代表团中还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由于北大联合国周举办得很成功，又有多国代表参加，这次活动被誉为“小型联合国大会”。

憎恶丑恶现象 北大女同学集体访问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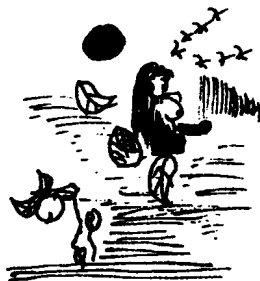
1948年夏天，北京大学女同学在暑假里作了一次社会调查，就是集体到前门外八大胡同访问妓院，了解那个丑恶角落的情况和沦落风尘的姐妹们的苦难生活。在8月19日的北平《新民报》上，作了简要的报道。

这次活动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女同学会组织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她们事先征得了学校当局的同意，并与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参加活动的50多位女同学，分成三个小组，分别访问那里的一二三等妓院。

八大胡同是北平妓院最集中的地方。许多妇女是从全国各地拐卖到这里的，有的是未成年的女孩。她们在妓院老鸨的威逼打骂下，操着暗无天日的皮肉生涯，很多人染上难以医治的性病，贻害终生。据说，在北大女同学到来之前，警方已经紧张地对妓院老鸨作了布置，让一些妓女躲避起来。但是，女同学们还是访问到了一些妓女。由于北大女同学对受苦受难的姐妹寄予了无限同情和关心，不少妓女吐诉了自己不幸的经历和非人的生活。女同学们在目睹了那个龌龊的地方，并搜集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就返回了北大。后来，还开了座谈会，总结了这一活动。

旧社会的北平和全国、全世界一些大城市一样，妓院与“红灯区”是公开存在的。市政当局不但不加禁止，还向妓院抽捐、收税。北大女同学的这次活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滋生的这一丑恶现象的尖锐批判与一大讽刺。

在北大女同学访问妓院不久，北平就在 1949 年初解放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很快就采取措施，扫除这一丑恶现象。经过充分准备，并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以后，在 1949 年 11 月 21 日，一举取缔了八大胡同等全市所有的妓院。使 1200 多名妓女跳出火坑。政府为她们治疗性病，教她们谋生技能，使她们获得新生。对 200 多家妓院的摧残妇女的老板、领家，分别据其罪行的大小，给予刑事处分或予遣散。野蛮的娼妓制度在北京的根除，受到了中外人士的赞扬！



魏建功教授到台湾推行国语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军队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日寇一直在阴谋“去中国化”，强令我台胞学习日语，限制学习汉语。1945年日寇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为消除台胞在学习汉语上受到的影响，加强汉语教学，我国教育部门特组成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并聘请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

1946年12月13日，魏建功请汉语学者，在北大孖民纪念堂座谈在台湾推行国语问题。到会的专家、教授有黎锦熙、朱光潜、游国恩、朱自清、郑天挺、顾颉、潘家洵、毛子水等，各位专家、教授踊跃发言，献计献策。我以记者身份采访了这次座谈会，并在《新民报》上作了报道。

魏建功（1901～1980年）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在台湾推行国语，成绩卓著，并办有《国语日报》。

一次有诗意的诗人节晚会

1947年6月23日农历端午节，在北大举行了一个颇具诗意的诗人节晚会。北大、清华、师院、中法、朝阳五个新诗社及北洋新诗研究会、北大大一诗小组，以及学校以外的诗文学、诗音讯、泥土等新诗团体，假北大北楼礼堂联合举行纪念晚会。到会的五六百爱好诗的青年，螺旋式地围绕着几位诗人：冯至、游国恩、叶鼎彝、闻家驊、朱自清、马彦祥、姚青苗，听讲演、座谈、朗诵。每人一杯汽水、两个粽子，一些花生米和饼干。真是一个有诗意的晚上。

游国恩讲五月五日与屈原的崇拜。他说，屈原的伟大，虽因不得志而死了，后来灭秦的还是楚国人。讨论什么是诗和诗的内容与形式的时候，冯至、叶鼎彝、姚青苗、闻家驊都说了很多话。同学们纷纷发言，有人说拿屈原死的日子来做诗人节，反不如用他生的日子，据考证他生在公元前143年正月二十二日。有人说：“屈原这个古人是有待考据而很渺茫的，纪念他定这个诗人节，反不如纪念闻一多。”